

吉登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城市风险社会”与人的“主体焦虑”探析

曹萱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省苏州市，215031；

摘要：安东尼·吉登斯认为，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城市已然成为了风险高度集中的场域。现代城市本身成为了“风险社会”的集中表达，并不断地影响着人的精神状态，最终使人进入到对自身的“主体性焦虑”中——它发端于现代高速全球化对城市自然空间的改造进程，导致了抽象体系和专家系统在城市空间内的失控，与普遍性的人对城市风险进行控制的心理能力的弱化，即“本体性安全”的缺场。因此，疏解城市风险社会下的诸问题，就必须以消解人的“主体焦虑”为前提，重构人与城市自然空间和谐共生、互利互惠的交往关系，复归人在城市自然空间中的主体性存在。

关键词：吉登斯；风险社会；城市空间；主体焦虑；现代性批判

DOI：10.64216/3080-1486.26.02.037

前言

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认为，现代全球化的增长是有极限的。“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一百年内的某个时候达到极限”。此后，作为分析现代性与全球化风险的专有名词，“风险社会”由德国学者贝克于1986年提出。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总揽了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等诸多对现代性社会之解构思潮的看法，将风险社会看作是现代全球化进程中人对自然空间加以改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不是一个革命性的社会，而是灾难性的社会”，是人类未来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吉登斯基于上述理念，于1990年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将风险社会理解为“失控的世界”，并用“信任”对现代性社会中的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风险社会是全球化中人们对专家系统、对超自然力量威胁（如核战争、生物破坏、全球性的自然灾害）加以控制的能力的“失信”的必然结果，必然导致现代人的普遍精神焦虑。

作为现代全球化发展的客观时空基础，城市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间。伴随着“风险社会”经由时空分离的产生，现代城市自然空间中的生存主体，即个人的“主体焦虑”内嵌于现代性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深处。现代全球化的发展本应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为人的发展带来更多解决问题的可能，但是，作为联结了现代个体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即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

指出的“信任”是否真实存在于现代城市中？个体为何在高速的城市化浪潮中时刻焦虑？个体的“本体性安全”是否能够在现代城市空间中得以实现？

1 全球化作为城市风险社会的诞生肌理

“我们正处于一个急剧变迁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一方面推动着人类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能不断地提升自身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城市的“自然空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为风险的全球扩散提供了重要前提——全球化解构了过往人类史中的地域屏障，局限于某一区域的风险便同全球化对这一屏障的解构而得以扩散到全体人类当中去。因此，人类的全球化不仅等同于纯粹外在自然危机的生成，同时等同于外在自然危机的全球化，即风险的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实际上是与现代意义上的风险同步出现的，并且当其成为当代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特征（即全球化时代）时，风险也成为同一个时期社会的基本特征。风险社会出现了”。人们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大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就必然面临风险和危机的普遍化。

一方面，现代全球化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的分离催生了高速城市化的进程。时空分离是现代城市将要面临的最大的共同问题——由于通信技术、交通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社会生活得以摆脱地域性、时间性的限制，进而得以在最大程度上扩大他们的交往范围。因此，区别于传统的、前现代的对时间

观念的重视，在现代城市空间当中，人类在诸活动内创造了“虚化时间”的维度，进一步地为时间的标准化（如标准时、时区）乃至人对时间的主观体验的“加速”提供了必要的尺度，大大扩张了现代性对城市自然空间发展的影响。

时间与空间的分离诞生了“虚化时间”的维度，同样也诞生了“空间的虚化”。“空间”在现代社会不再等同于“地点”，生活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人只能将空间理解为“某一个东西”，而空间的虚化则意味着人在社会交往当中要面对逐渐增多的“地点的缺场”。同时，越来越多的与主体相隔甚远的事物对主体当下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而关于时间的虚化与空间的虚化则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时空分离成为了使遥远社会活动嵌入在场情境的必要的原则”，城市中主体的社会生活不再因固定的时空受限，便激活了现代组织的运作动力，促使城市的增长与发展同愈加密集的人口，即不断加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紧密结合。城市化进程因为时空的虚化而使人的活动愈加不受前现代的限制，生活在城市中的主体越来越能够在单个城市当中完成更多的跨时空社交需求，而不需像前现代社会那样受限于固定时空的拘束，这就大大拓展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尺度。

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全球化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形成城市风险社会。城市自然空间的发展无外乎是城市内部时空的发展，当现代性带来的全球化与城市化不断发展的的时候，风险也就必然同时不断发展。因此，相对于前现代的城市而言，现代城市的风险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前现代的城市更多基于某一确定的目的（如军事、政治、商贸）而存在，城市中主体的社会关系属性更多同这些目的完全对应，同时，联结前现代城市中主体社会交往的纽带是血缘、宗族、门派等受限于时空限制的联系物。但时空在现代因客观力量的虚化和浓缩（如飞机、移动网络通信），使得生活在城市中的主体，即人对其自身内部时间的感受不断变化，城市逐渐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形成了区域间的共同体，城市功能、形象与人的生活时刻变得更加复杂且难以被直观把握，便造成了人对地域安全感的消解。

所谓“安全感”，即前现代社会中联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信任”纽带。人们因实在的时间流动、熟悉的自然空间地点场域和社会交往中人与人所共同拥有的“关于存在于同一时空下的某一固定事物的集体性记忆”而诞生安全感。但现代城市中的人却会对这种安全感觉陌生，现代城市社会因为其自身的不断发展

诞生了越来越多的“人造风险”，愈加琐碎细分的专业知识、等级严密的专家系统对这些人造风险所进行的控制伴随着知识的不断生产进入了现代城市社会中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不可控的、未知的风险因其本身的威胁或是人们对专家系统的怀疑——即怀疑“由现代性的脱域机制所产生的知识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在抽象体系权威的控制下各种系统在现代性社会下对人的调控和监管”——就滋生了生活在现代城市空间中个人的“主体焦虑”，并最终促使现代城市社会成为了风险社会。

2 个体在城市风险社会中的“主体焦虑”

“现代城市扩展而产生的日常生活方式与以前的社会完全不同”。基于地缘、民族等纽带联结成的“风俗”传统在现代走向消解，经验主义模式的日常生活逐渐被功利色彩取代。功利性的日常生活既催生出了大量的“拒斥个性”的城市公共空间关系，又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传统日常生活所进行的“城市空间关系上的总体性异化”。“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时间商品化联系在一起的是空间的商品化”。自然空间本身成为了流转的商品，商品房的价值成为了划分人与人不同的日常生活行为模式的客观基础。这就导致了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隔离，人只知“某一空间”，却难窥“整座城市”，人在城市中的交往关系成为了某种单向度的、为了完成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功利的、线性的活动。那么，城市空间的同质性和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是等同的，它们都是源于资本入侵所导致的日常生活功利化、城市空间商品化特征，城市的发展操控了人的生存行动，人只能在资本操控下服从异化的城市空间的支配。

前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居住形式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改变，邻里关系的变化同这一变化同步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现代城市自然空间随着城市的扩张正不断进行着对城市区划的迭代更新，先前依附于前现代经验模式下人们对某一特定地点的熟悉感正因此而不断淡化，邻里关系也由一种依附于土地、家族情感的固定关系演变为依附于地租、工资等变化的、动态的关系。所以，在现代城市中，邻里的交往关系之所以成立，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们生活在相似的商品化空间中”，这既代表着主体间的经济基础差异不甚明显（即邻里间使用的建筑商品房的价值近似）、又代表着不同区域间的主体交往因空间的商品化程度差异而造成了割裂，进而这种割裂又深刻影响了城市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与交往深度。不同人群因同样的归属感聚集，城市被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分割成了不同的

价值主导区域，进而形成了由某一特定族群、特定职业与阶级构成的“社区”。人们往往在这种社区模式下寻找属于自身的身份认同，进而便加重了当风险在城市社会中蔓延时，同一个城市内部的不同人群在交往过程中所引发的焦虑、冲突和不理解。

上述生活在现代城市自然空间当中的人所直观感受到的即“主体焦虑”，这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即个人在面对城市风险社会的种种表现时做出的“对本体性安全的渴望”。也就是说，“主体焦虑”是相对于“本体性安全”，即“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而言的概念。本体性安全所联结的对事物的恒常信任是人在婴儿的早期体验中获得的。婴儿一开始通过对看护者的在场、缺场判断周遭环境的可靠程度。随后，婴儿通过树立对看护者持续存在的信念对周遭环境持续树立信任。所以，信任的前提在于通过对不同自然空间形式的判断来觉察安全感，在熟悉的的空间中实现安全感。但是，生活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个体所感受到的不安全感已被普遍化为一种社会焦虑心态，这种矛盾的、充斥着不安全感的“主体焦虑”正不断地被现代城市社会放大。当人必须在城市内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存时，人就必须寻找新的能够投射以本体性安全的空间来代替曾经被个体赋予本体性安全的空间。然而，现代城市自然空间的资本化运作、邻里关系的区域化隔离便意味着现代城市不具有同传统城市相类似的恒常性，瞬息万变是现代城市最基本的底色。

由此，传统的经验主义生存方式在现代城市生活中遭到了淘汰。“现代性有着与社会再生产和自我认同相关联的控制取向，这两种取向在道德经验的层面上有一定的特殊后果”。现代性思维方式在城市化中不断推广着工具理性，日常生活的经验主义图谱在现代城市中必须服从于不断推行的普适化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模式。人的身心健康状态、伦理恒常守则成为了第二性，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与人对物的价值攫取成为了第一性。人因从熟悉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而感到不安全，人在现代城市当中的存在几乎是“被抛入”的。人只能被迫去信仰由专家系统、抽象体系所带来的由科学所赋予的安全感——然而，当专家和抽象系统的复杂性演变为缺乏专业知识的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维度时，当专业知识只能通过碎片化的方式进入到现代城市居民的大脑时，对这些系统的信任便又会成为新的值得焦虑的问题。所以，城市居民的社会心理也就呈现为一种普遍的“主体焦虑”状态了——它们既焦虑城市的发展带给自己的种种时

刻产生的、曾不存在的新问题，又焦虑自己在城市中的主体地位是否真实地存在。

3 消解城市风险社会中人的“主体焦虑”

“就对现代性的风险景象作出适应性反应的范围而言，非专业人士和专家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不明显”。在现代性社会下，“风险”具有全球性和人为性的特征，风险既是超越国家、地区、时间与自然空间而存在的广泛存在，同时又是一种“人造风险”。如果谈及消解“主体焦虑”，进而重归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本体性安全”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认识到：在城市风险社会中，主体焦虑本质上仍是一种对现代性脱域机制下抽象系统的“信任危机”——最主要的是对城市发展的“经济本位”思维的超越和重构城市空间资源共享的信任机制。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在于瓦解资本对城市空间的过度入侵，另一方面则在于打破现代城市空间的区域隔离。

首先，促进城市自然空间权力的平衡，重建科技的伦理规范以真正实现技术的人道化。一方面，人与城市的关系本应是人与自然空间的关系，空间本就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自然资源，但现代城市的发展却在基于资本逻辑的运作规则下诞生了“对商品化空间的再生产”。空间的自然属性被商品性所取代，成为了权力运作的场域与人的附属品；另一方面，“技术人员并不知道他工作是因为，而且一般说来他也不关心……引擎强迫着他工作，而且不能容忍任何东西阻止机器的运转”。在现代城市中，科技的运用往往同资本系统密不可分，持续不断的技术发展为极权主义渗透和资本增殖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由此带来的专家与抽象系统的失控使城市中的人愈加焦虑自身的存在。因此，对科技的伦理规范进行重建成为了疏解城市空间“主体焦虑”的核心举措——这就意味着，支撑城市发展的技术伦理必须既要尊重人的价值理性，又要尊重城市生态的有序维护，将人在城市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同城市空间的规划发展视作同一个整体，进而最终实现城市内不同区域空间的权力对等。

其次，建构城市空间的质量导向，瓦解资本对城市的过度入侵以克服匮乏型体系症结。“追求资本主义的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因为在资源其他方面它不可能自我维系”。城市经济的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城市自然空间的商品化程度高低，由商品化主导的城市发展仍是基于资本逻辑的，其只能解决部分人的精神焦虑而不能解决城市普遍的“主体焦虑”。因此，疏解“城市病”、控制城市风险社会对人的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更需要城市发展走上真正的高质量道路，其关键在于

“通过构建生活政治和超越匮乏型体系”实现城市空间发展与个体心理状况的平衡——前者意味着超越工具理性的功利主义逻辑，通过关注个体的感受与情感体验来消除空间不平等现象，旨在希望重新确立未来城市发展的价值维度；后者意味着在超越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与绝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思维下的“第三条道路”，即通过实现发展与居民整体获得感相平衡的方式看重城市经济对居民生活质量带来的增益。城市必须通过建构经济效益与人的生存尊严双向互通的发展机制，才能为其自身建构起有效的质量导向发展路径，为消解城市风险社会中的“主体焦虑”提供可能性。

最后，实现城市自然空间资源的共享，构建跨阶级沟通的包容型社会以实现广泛多层次的民主参与。“平等意味着包容性，不平等意味着排斥性”。城市自然空间理应是所有城市居民的自由生存空间，城市不应成为不同阶层相隔的场域。城市自然空间之所以存在阶级性，是因为不同阶层过大的贫富差距助长了资本对城市自然空间的入侵。因此，重构人在现代城市自然空间当中的“本体性安全”，将最终指向人对城自然市空间资源，亦即城市自然空间纯粹性的复归。城市社会必须实现其本应有的开放与共享，不同人的社会地位不应该通过其能创造的资本价值的多少加以分类，人与人之间必须要拥有均等、公平的生存机会，社会最终必须要实现对城市发展的伦理价值尺度的第一性追寻。所以，必须要在城市内建立有效的主体间交往与对话机制，使不同的人均能合理地参与到城市社会与城市自然空间治理当中，以有限的城市自然空间资源重构日常生活对传统的依赖，在不断变化的城市自然空间中真正地视多元为安全感，从而将“现代性‘激进的卷入’”贯彻到底。

4 结语

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城市已然成为了一个风险高度集中的场域，人在城市自然空间当中所能感知到的不再是现代性的积极成果，而是“主体焦虑”所引发的本体性安全的缺失。透过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可以看见的是，现代城市中的人的普遍精神焦虑虽然严重，但

仍有解决之法。只有城市社会真正走向了空间权力的平衡与对空间质量导向的真正追寻，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才能真正地寻找到自身的本体性安全，从而建构起自身之于城市的主体性地位，从而消解“主体焦虑”的疑难病症，使全球化与现代城市的发展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 [1] D·梅多斯. 增长的极限[M]. 李宝恒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 [2] [德]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M]. 何博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3]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4] 杨雪冬等著. 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040.
- [5] 王秀. 吉登斯城市空间思想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22.
- [6] 孙凤兰, 邢冬梅. 现代性中信任问题论衡——基于吉登斯信任理论的思考[J]. 北方论丛, 2016, 05: 156–169.
- [7] [英] 吉登斯. 社会学: 批判的导论[M]. 郭忠华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3.
- [8] [英] 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权力、财产与国家[M].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10.
- [9] [英]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10] [英]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代时期的自我与社会[M]. 赵旭东、方文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11] [英] 吉登斯. 第三条道路,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 郑戈译. 北京: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作者简介：曹萱（2001—），男，汉族，黑龙江省鸡西市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性批判理论。